

诗文评的定位:东亚书目所见文学批评观念辨析*

成 亚 男

内容摘要:书目类例是反映学术观念的方式之一。朝鲜书目普遍将诗文评类著作置于子部说家类,这与唐代以降中国书目多在集部为诗文评单设一类迥然有别。朝鲜书目的这一类例设置,是朝鲜诗话论事远多于论辞、偏于杂事闲谈的事实的反映,也是主动选择袭用清代《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子部说家”的结果,体现出朝鲜文人对诗文评作品评价较低的观念。相较于朝鲜与中国而言,日本书目鲜依四部,多将诗文评与诗文创作并列一类,体现出对诗格与诗技的高度重视,以及论诗重视诗歌本身的特点。

关键词:东亚书目 诗文评 文学批评

引言

古典目录学是门径之学。目录之书多按一定标准对所涉书籍分类,这体现出著者对不同书籍的定位,即郑樵所谓“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①。至于目录学家精心撰写的小序与解题,更蕴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的期待,能明确表述古人的学术观念。

通过书目类例探究古人学术观念这一研究思路,有其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就适用范围来说,目录须是根据所涉书籍的性质(种类与内容)进行分类,而非纯据物质载体分类者;在此前提下,小序与解题清晰条畅

* 本文系 2025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杜诗在古代东亚的接受与经典化研究”(KYCX25_0065)成果。

①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804、1806 页。

②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101 页。

的书目,以及读书推荐目录,由于较易反映著者的学术理念,故讨论价值往往较高。就注意事项而言,首先,书目类例的设置但凡成功,往往会被后代因袭,故需格外注意类例的“创制”与“变易”,由此捕捉古代集体或个人学术观念的动态变化。其次,对类例的研究需持“比较的眼光”,而所谓比较,既包括时间上的,也包括空间上的。最后,由书目所探及的学术观念,应能与当时其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

本文在以上思考的统摄下,探究朝鲜书目中诗文评作品的位置与所获评价,并与中国和日本进行对比。中国古代“诗文评”一词作为二级类目出现于明代,在明清书目中被广泛使用并为《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四库总目》”)继承,是对古代评诗论文之作的统称。《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在《文心雕龙》《诗品》之外,又举诗格(举皎然《诗式》为例)、本事诗(举孟荣《本事诗》为例)、诗话(举欧阳修《六一诗话》、刘攽《中山诗话》为例)三类,并分别概括其特点为“备陈法律”“旁采故实”“体兼说部”^①。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与文学批评的关联,周勋初、张伯伟、彭玉平等学者均有关注^②,从混杂于总集到唐宋的文史类,再到明清的诗文评类,中国古代的诗文评类例设置渐趋独立,而几乎始终位于集部之内。古代书目自唐宋起为诗文评著作专设一类,体现出中国古人对此类作品“讥评文人之得失”^③属性的重视。不过,汉文化圈诸国的目录之书^④各具特色,在分类上尤其各有千秋,比较中日韩三国书目著录诗文评作品的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1779页。

②周勋初:《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与著录》,《周勋初文集》第7册《无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3—234页。张伯伟:《宋代诗话产生背景的考察》,《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第53—60页。彭玉平:《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传统目录学之关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51—54页。

③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二四八,中华书局,2011年,第6672页。按,此语出自马端临对《中兴艺文志》的引用。

④现存的朝鲜时代书目大约有80种,张伯伟择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26种,编为《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私家书目四类;日本古代书目繁多,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选取26种,编为《日本书目大成》(汲古书院,1979年)。两套书目能大致反映古代朝鲜和日本书目的基本情形。笔者亦尽力参阅两套书目之外的其他目录,力求较为全面地把握两国古代目录学的面貌。越南书目所存太少,而且年代较晚,故本文略而不谈。

不同情况,抽绎其中的批评观念并进行比较,无疑能在不同文化的相通与变容中,更为全面地理解古代文学批评理路。

一、子部说家:朝鲜时代书目中的诗文评

除佛经目录外,现存韩国古代书目均编纂于朝鲜时代,且直到正祖时期(1776—1800)方大量出现。正祖李祘在位期间产生了多部书目,其中《奎章总目》是现存最早依四部分类的书目,在朝鲜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还亲自撰写《群书标记》,为“御定”“命撰”之书一一详加著录,可见对目录之学的重视。朝鲜正祖朝大致对应清乾隆朝中晚期,《奎章总目》成书略晚于《四库总目》,故理论上此时朝鲜文人进行书目编纂时,可对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书目予以选择性的参考,而其间的同中之异就格外值得关注。

本节根据是否采用四部分类,将朝鲜书目分为两类讨论,以突出朝鲜书目著录诗文评作品的特别之处。

(一)依四部分类的朝鲜书目

1. 将诗文评之作置于子部说家的普遍性

与中国书目的基本情况迥然有别,现存朝鲜书目中凡依四部分类者,几乎都将诗文评之作著录于子部说家类,无论王室书目、册版书目还是私家书目均然。

朝鲜书目的这一类例设置始于首分四部的《奎章总目》。该书把诗文评类作品全部置于子部“说家类”,将《岁寒堂诗话》《浩然斋雅谈》《古今诗话》《古今词话》等诗话词话与《世说新语》《容斋随笔》等小说笔记并列^①。《奎章总目》未为诗文评专设一类,是否由于此类作品数量有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奎章总目》中天文类和卜筮类都只著录了一部书,可见编者未将诗文评归为一类,并非这类作品不够多所致;而将之与笔记小说杂列于说家,又可看出朝鲜文人并未特别重视其评论诗文的特质,而更强调其“体兼说部”的特点。其后王室书目中,《内阁访书录》仅分经史类、子集类,而将清吴景旭《历代诗话》置于子部^②;《西序书目签录》与《西序书目草本》均在子部说家类著录多部诗文评作品,其中《西序书目签录》所录均为高丽朝鲜诗话,包括《栎翁稗说》《破闲集》《补闲集》

^①《奎章总目》卷三,《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245—254页。

^②《内阁访书录》卷二,《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547—548页。

《芝岷(峰)类说》《诗本要标》等^①;而《西序书目草本》所录除朝鲜诗话外还有《艺苑卮言》《诗法要标》等中国诗格诗话^②。上述书目足以证明将诗文评置于子部说家类的做法,在朝鲜王室书目中具有普遍性。

朝鲜现存册版目录(指纪录某处藏有哪些书板的目录)中,徐有渠所撰《楼版考》是唯一一部依四部分类者。徐有渠乃《奎章总目》修撰者之一徐浩修之子,此书分类方式与《奎章总目》一脉相承,于经史子集之下共设27个小类,对各书有详细提要。此书子部说家类著录五种著作,其中三种为诗话: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齐贤《栢翁稗说》。节录三书解题如下:

《破闲集》:杂记诗话而详于事实……高丽一代名辈佳句之至今可征者,多赖是篇及崔滋《补闲集》。

《补闲集》:补辑李仁老之所未收,浮屠儿女之诗句可资谈笑者,亦并收录。

《栢翁稗说》:前后二录,前录纪公私乘牒,后录多诗文评隲。^③徐有渠一方面指出诗话多记野史逸闻“可资谈笑”,这是朝鲜诗话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也指出诗话“诗文评隲”的性质,这是这一文体的功能属性。将诗话与杂说之书并列于子部,既由朝鲜诗话偏于闲谈的事实决定,也是徐有渠对诗话一体考量定位的结果。

2. 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最具学术理念的一部朝鲜书目

朝鲜时代的私家书目较有体系者现存《海东文献总录》《洪氏读书录》《清芬室书目》三种,其中洪奭周(1774—1842)《洪氏读书录》可谓最能反映朝鲜文人目录学意识的一部书目:此书既非藏书目录或访书目录,也非侧重书籍交流和文献保存的史志目录,而是专为指导其弟洪吉周读书而作的推荐书目录,且有精心撰写的小序与解题,因此最能体现朝鲜知识人对读书次序、学术体系及各种书籍重要性的认识,这些无疑是真正属于目录学

①《西序书目签录》可在此网站在线阅读:http://kostma.korea.ac.kr/viewer/viewer-Des?uci=RIKS+CRMA+KSM-WZ.0000.0000-20140409.TOYO_1056&bookNum=&pageNum=。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

②《西序书目草本》可在此网站在线阅读:http://kostma.korea.ac.kr/viewer/viewer-Des?uci=RIKS+CRMA+KSM-WB.1917.0000-20140418.TOYO_1258&bookNum=&pageNum=。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

③徐有渠:《楼版考》卷四,《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4册,第1895—1896页。

“门径”的思想。洪奭周有家学渊源,其外祖乃大邱徐氏,他与徐氏父子颇有往来,其诗集《海居斋诗钞》之序乃徐有渠所作,故洪奭周的目录学思想有与徐氏父子相承之处。《洪氏读书录》子部“说家”类小序曰:

说家者亦杂家之流也,或称引古今,或考证经史,固往往儒者之所务。然率涉猎泛滥,取资于谈说而已,不能以成一家言,故曰说家。其类有六:一曰论说,二曰记述,三曰考证,四曰评艺,五曰类事,六曰杂纂。^①

洪奭周对“说家”类的评价较低,认为乃取资闲谈而不能成一家言的泛泛之论,这也是朝鲜文人对说家的总体定位。“说家”下分六类,其中的“评艺”类是现存朝鲜书目中唯一专为诗文评著作而设的一类,值得重点讨论。此类共著录八部作品,包括中国的《文心雕龙》《诗品》《六一诗话》《续诗话》《韵语阳秋》《艺苑卮言》《诗薮》,和朝鲜的《东人诗话》。可见“评艺”类与《四库总目》中的诗文评类颇为相似,却无诗格类和本事诗之类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作品,作者给予的评价普遍较低:

《文心雕龙》:文章者,学问之精华也,是故以学问为本,以理为主,而气辅之,未有不工者也。规规而求诸章句法度之间,抑末矣。古之君子未尝论文,论文盖自是书始。虽然,亦可谓精且备矣。^②

《诗品》:诗之于文章,末也。诗品之于诗,又赘也。后世之文士既以诗学为大务,而论诗之书自此始,亦不能不存其梗概云尔。^③

《东人诗话》:东人之有诗话者盖渺。是书于诗家无甚发明,而征野闻者或取焉。^④

《文心雕龙》和《诗品》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两部极具体系性的诗文评著作,在后世虽也偶被批评(如晁公武称刘勰“疏略”^⑤),但整体来说颇受重视,如《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曰:“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⑥章学诚更认为二书乃“专门名家”,称赞道:“《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

①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第4298—4299页。

②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第4302—4303页。

③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第4303页。

④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第4305页。

⑤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76页。

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第1779页。

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①然而洪奭周竟以“末矣”“赘也”形容,可见他对诗文评论之作整体颇为不屑,对拘泥于“章句法度”的行为更是不满。至于他有所称赞的著作,都是因人存书,如称自数十家宋人诗话中选择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著录是“取其人也”,又如评葛立方《韵语阳秋》曰“其论诗也,不主于辞而主于义,是以君子颇取焉”^②,均可看出他对程朱性理之学的恪守。

此外,洪奭周作为朝鲜唯一一位为诗文评著作专设一类的目录学家,能辩证地看待诗话这一文体。他意识到诗话形式自由且内容不拘,不同诗话中诗文评隔的含量有所不同。例如,他将徐居正《东人诗话》归于“评艺”类,而将成伋《慵斋丛话》、李晔光《芝峰类说》录于“论说”类,显然认为前者相较于后两部书而言属于更为纯粹的论诗之作。《慵斋丛话》解题曰:“其书或记述闻见,或评隔诗文,不名一体,故曰丛话。”《芝峰类说》解题曰:“其记述时事似野史,评隔文章似诗话。”均能综合评价其内容与性质。也正因此,洪奭周认为《慵斋丛话》和《芝峰类说》“皆论说之属,而考证评艺之文亦杂出于其中焉”^③,辨析较为清晰。

洪奭周所指出的,是诗话一体含义宽窄的概念问题。中国古代对诗话概念的理解,自宋迄清渐有泛化的趋势,如明代徐渤《徐氏家藏书目》集部设“诗话类”,将锺嶠《诗品》、皎然《杼山诗式》、孟棣《本事诗》与诸多诗话并列,已用“诗话”一词统称各类评诗论文之作^④;清人林昌彝云“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⑤,同样混杂了诗话与其他诸体的界限。正如张伯伟所说,“(论诗)性质上的相通并不等于体制上的相同”,“如果不从体

①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第648页。

②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第4303页。

③以上均见洪奭周:《洪氏读书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8册,第4300页。

④徐渤撰,马泰来整理:《徐氏家藏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49—351页。

⑤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5页。又,除以“诗话”一词泛指诗文评作品外,诗话概念的泛化还有另一表现:少许著作在宋代书目中不属于诗话,但在明清已被认为是评诗论文之作。比较典型的例子如《艺苑雌黄》,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属子部杂家类,至《宋史·艺文志》中已属集部文史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属集部诗文评类,这显然是对诗话一体的理解渐趋宽泛的结果。陈振孙并不认为《艺苑雌黄》属于诗话,在解题中只称该书“大抵辨正讹谬”(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丝毫未言其与诗文评论的关系。

制上着眼,就无法显示出各种批评形式的特点,也就无法进一步探究中外文学批评在更深层次上的异同”^①。不仅诗话一体与其他批评形式有所不同,不同诗话之间诗文评隔的含量也有待辨别,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今日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非常重要。

(二)不依四部分类的朝鲜书目

朝鲜也有部分书目的体系与四部分类相差较大而更为灵活,它们著录诗文评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均未将其视作专门一类,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提炼如下。

首先,朝鲜存在个别将诗文评与诗文作品归于一类的书目,较有特色者有二。一乃《承华楼书目》,此书虽设经史子集四类,但其后又设有诗类、文类、丛书类、说家类等 19 类。其中集类均为别集;诗类包括《诗人玉屑》《诗法入门》《修词指南》《清脾录》等诗话诗法类著作和多部诗歌总集^②;至于说家类,则未见诗文评作品。《承华楼书目》将诗文评与诗歌总集并列而区分于说家类,可见编者意识到诗话与诗歌直接相关,这一分类方式在朝鲜书目中非常罕见。二乃《缉敬堂曝晒书目》,该书分经、史、子、集、书画、试帖、杂著、小说等共 12 类,其中集部《带经堂诗话》与杂著部《岷佣说诗》《诗学问难》均属诗评之作,至于小说部则未见任何诗评作品^③。此书编者将《带经堂诗话》置于集部,与诸多别集、总集并列,这一归类在朝鲜书目中十分特别。但也需注意,这部书目并非采取严格的四部分类,且诗文评作品同时出现于集部与杂著部,又以后者居多,故其将诗文评置于集部的观念并不彻底^④。

其次,在“说家”“评艺”之外,将诗文评作品归于“杂著述”与“野史类”的书目亦不乏其例。如上文所述《缉敬堂曝晒书目》便将部分诗评作品置于杂著部,这一分类方式可追溯至金佺(1597—1638)私撰的《海

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466页。

②《承华楼书目》,《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3册,第1349—1351页。

③《缉敬堂曝晒书目》可在此网站检索并在线阅读:<https://kyu.snu.ac.kr/>。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

④整个朝鲜时代,未见将诗文评之作全部归于集部的书目。直到近代初期朝鲜总督府所编《唐板图书目录》,此书虽未题以经史子集之名但实按四部排列,以“修辞类”统摄诗评之作,且将其置于集部。这进一步说明,在进入现代学术体系之前,朝鲜书目将诗评置于子部说家的普遍性。《唐板图书目录》可在此网站检索并在线阅读:<https://kyu.snu.ac.kr/>。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

东文献总录》。此乃朝鲜首部解题目录,其“诸家诗文集”类未见任何诗话,仅有释觉月的《诗评》属于诗文评类作品,但在“诸家杂著述”类则著录有《破闲集》《续破闲集》《补闲集》《东人诗话》等多部诗话^①,可见编者对诗话的定位不过是“杂著述”。《海东文献总录》在现存朝鲜书目中时代较早,说明朝鲜文人不甚重视诗话这类作品的观念久已存在。至于将诗文评归于“野史类”的,如李肯翊(1736—1806)所作史志书目《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该书以介绍中朝间的书籍交流史为目的,共分15类。“文集类”以人为纲,在每位文人名下排列其别集、诗话、选集,如李仁老名下有《银台集》《双明斋》《破闲集》,崔滋名列《补闲集》《农隐集》,李齐贤名列《益斋集》《栢翁稗说》,徐居正名列《四佳亭集》《东文选》^②等。但在以著录小说、笔记、日记为主的“野史类”,却又出现成侃《慵斋丛话》、南孝温《秋江冷话》、徐居正《东人诗话》、许筠《蛟山诗话》等多部诗话^③。事实上,凡是书名出现“诗话”二字者,都被作者归入“野史类”,这进一步表明,从目录学的立场出发,在整体的知识系统中,朝鲜文人将诗话类作品理解为闲谈杂说、野史逸闻的观念,具有普遍性。虽然若缩小范围,局限在文学内部或文人圈中来看,他们对诗话也不妨抱有肯定性的评价^④。

总之,凡依四部分类的朝鲜书目,几乎全将诗文评之作置于子部“说家类”;不依四部分类的,偶有将其置于“杂著述”“野史类”者,但整体对诗文评的定位均不甚高。这相较于中国普遍在集部为诗文评专设一类而言,无疑非常独特。

二、朝鲜书目将诗文评置于子部说家的原因

朝鲜书目将诗文评作品著录于子部说家的原因何在? 概括而言,既由朝鲜诗话偏于闲谈逸闻的事实本身决定,也受到清代《浙江采集遗书

①金佺:《海东文献总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7册,第3638、4132—4133、4137—4138页。

②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5册,第2425、2425、2426、2431页。

③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别集·文艺典故》,《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5册,第2433、2437页。

④详参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增订版)》附录四《东亚诗话的文献与研究》,凤凰出版社,2024年,第373—387页。

总录》的影响,是内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以下分别述之。

(一) 朝鲜文人对诗话的定位与对道德文章的追求

章学诚曾将诗话分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两类^①,中国诗话论事多于论辞,但二者比例还算均衡。诗话虽始于欧阳修“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但在北宋已经呈现出从论事向论辞的过渡,如三部诗话总集《诗话总龟》《茗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的理论性逐步增强,呈现出从存诗到存论、从诙谐到严肃、从闲谈到诗道的变化;而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可称为理论性诗话的代表^②。相较于此,朝鲜诗话却似乎一直停留在对《六一诗话》等“炉边闲谈”的模仿,论事远多于论辞,且二者比例极度失调,这是朝鲜目录学家所面对的著作现实,这一现实决定了目录学家对诗话的基本定位。以两部朝鲜早期诗话的作者自序为例:

或至于浮屠儿女辈,有一二事可以资于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③

此录也,本以驱除闲闷信笔而为之者,何怪夫其有戏论也。^④

无论是“资于谈笑”还是“驱除闲闷”,都可见对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继承。朝鲜诗话以谈笑、戏论为开端,且零星出现几部后又有所中断,而后续诗话变化亦不明显,基本仍沿闲谈一路。姜希孟《东人诗话序》乃东人言“诗学”二字之始,他描述朝鲜文学批评的起源曰:

吾东方诗学大盛,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备全众体,而评者绝无闻焉。及益斋先生《栎翁稗说》、李大谏《破闲》等编作,而东方诗学精粹得有所考。厥后百余年间,莫有继者,岂非诗学之一大慨也!^⑤

朝鲜诗话本以闲谈杂说为主,即便有学者对诗话一体予以反思,也往往是觉得朝鲜文人只录“诗话”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增多对“时事”的记录:

我国名为儒者亦非一家,徒知词藻之为文,而不知著书垂范。惟李仁老、崔滋、李齐贤,著《破闲》《补闲》《稗说》等书,然惟录诗话,

^①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第648页。

^②详参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469页。

^③崔滋:《补闲集序》,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④李齐贤:《栎翁稗说序》,《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38页。

^⑤姜希孟:《东人诗话序》,《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60页。

而不能广记时事,可笑也已。^①

可知偏于闲谈杂事不仅是朝鲜诗话的基本特点,也是朝鲜文人对此体的文体期待。进一步来说,这种重事不重辞的观念伴随着朝鲜文人对道德学问的追求,是其文道合一观的具体表现。如南九万所云:“余于诗,所谓四声八病者,则诚非所习;若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亦尝略闻之矣。”^②四声八病可理解为形而下的声律技法,而温柔敦厚则是礼乐文化象征的儒家《诗》教。这种思想用徐居正的话来说,就是“文者贯道之器”:

文者贯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今之学者,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经,不规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则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③

这种文本乎道的思想、重道轻技的倾向,比古代中国更深。既如此,朝鲜文人对诗话不满,将之归于子部说家乃至解题中严厉斥责,也就在情理之中;甚者有些文人不仅对诗话不满,对作诗这一行为本身就不甚重视。洪奭周说得直白:

夫诗固一艺耳,能之亦可,否之亦可,与其弊精分神而以害吾有用,无宁不能之为愈也。^④

可见朝鲜文人对道德学问的追求。洪奭周之语并不代表朝鲜文人不重视诗歌创作,也不意味着朝鲜诗歌不讲求技巧,而是意在说明诗歌创作应是君子立身行道、经世致用的途径,单纯的诗歌技艺本身并非创作目的,此点决定了朝鲜书目对诗文评较低的定位与评价。而朝鲜文人的这种观念,与中国古代一部十分特殊的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下称《浙江总录》)一拍即合,朝鲜目录学家有意选择袭用此书类例,直接造成将诗文评置于子部说家的普遍现象。

①成侃:《村中鄙语序》,《虚白堂集》文集卷七,[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4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474页。

②南九万:《琴湖遗稿序》,《药泉集》卷二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32册,第449—450页。

③徐居正:《东文选序》,《四佳集》文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第248页。

④洪奭周:《原诗下》,《渊泉集》卷二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93册,第539页。

(二) 朝鲜书目对《浙江总录》的有意借鉴

1. 《浙江总录》在中国古代书目中的特殊性

虽然中国古代书目普遍为诗文评作品在集部设置专类,但也存在将诗话统统著录于子部的特例,较有影响者有三:北宋《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下称《秘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清代《浙江总录》。《秘目》依经史集子排列,集部设文史类,但所录诗文评作品除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张为《诗人主客图》外,全为诗格和文格;而该书著录的三部诗话(欧阳修《诗话》、司马光《诗话》、刘贡父《诗话》)全部位于子部“小说”类^①。可见编者认为诗话性质类似小说笔记,与标举诗文范式的诗格有所不同。

成书略晚于《秘目》的《郡斋读书志》有袁本与衢本之分,简单来说,袁本成书较早,衢本是修订后的版本,二本之间互有优劣^②。在袁本基础上,衢本于集部增设“文说类”,使《文心雕龙》《修文要诀》《本事诗》独立成类,显示出晁公武文学批评意识的增强^③。不过,袁衢二本均将诗话之作归入子部“小说类”^④,与《世说新语》《太平广记》等小说笔记并列,且具体解题对诗话的评价也不甚高,如称欧阳修《六一诗话》“戏作此,以资谈笑”,称王直方《归叟诗话》“多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⑤等,可见晁氏尚未重视诗话评论诗文的功能。《秘目》与《郡斋读书志》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两部收录诗话的书目,彼时诗话一体刚刚诞生。二书将诗话全部置于子部小说类,说明此体本与小说有相近之处,这也是《四库总目》称诗话“体兼说部”的原因。但这一分类方式只短暂出现;此后

①《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332—333页。其中欧阳修《诗话》原文作“欧阳修《诗集》二卷”,所附叶德辉考证曰:“欧阳公《诗集》不应入此,疑是《诗话》之误。”

②详参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郡斋读书志校证》附录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1—1404页。

③关于晁公武的文学批评观念,详参吴承学、黄静:《〈郡斋读书志〉与文学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13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诗话的特殊性应如何评价,本文观点与该文有异。

④《郡斋读书志》著录的诗话类作品有陈师道《后山诗话》、司马光《续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范温《诗眼》等(《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三,第600—602页)。

⑤《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三,第601、602页。

直到清代,几乎所有书目都将诗话纳入集部^①,鲜有的例外可能就是《浙江总录》。

《浙江总录》是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浙江省奉旨采集遗书的提要目录,故其成书略早于《四库总目》。该书分十一集,以第一至十次进呈书目编成甲至癸十集,十一、十二次补编为闰集。此书凡例列出了斟酌参考的前代书目,其中便有《郡斋读书志》。在类例设置上,《浙江总录》依经史子集为次,子部有“说家类”,下分“总类”“文格诗话”“金石书画”“小说”四小类,其中“文格诗话”部分著录有文格(如宋陈骙《文则》)、文话(宋王铨《王公四六话》)、诗格(明梁桥《冰川诗式》)、诗话(宋阮阅《诗话总龟》)等大量评诗论文之作^②。至于该书集部,则未见任何诗文评类作品。可见,相较于前举二书而言,《浙江总录》的类例更为特别:它不仅把诗话类,而且把诗文评其他各类著作,全部置于子部说家类,这在中国古代书目中可谓绝无仅有。同时,虽然含义相近,但《浙江总录》“说家类”这一名称删掉了“小说类”或“小说家类”中的“小”字,在古代书目中同样独一无二,而此点对于判断其与朝鲜书目的联系非常关键。

《浙江总录》在中国古典目录学中的特殊性颇值得讨论。它一改四部分类诞生以来把诗文评著作置于集部的普遍做法,将各种评诗论文之作全部挪至子部说家类,此举蕴含对诗文评价值和定位的重新考量。尽管此书编者并未明确表述设置这一类例的原因,但我们仍可进行一定推测。就四部分类而言,子部的地位整体高于集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子部的所有分支均是如此。子部的小说家类多是稗官野史乃至异闻传说,班固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并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③,将小说家视为不入流者,这决定了后世对小说家的基本定位。

①当然,这并不是说诗话之作从此就从子部完全消失了。如元人所撰《宋史·艺文志》对诗话一体缺乏明确定位,导致归类时标准不一,将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归入小说类,又将司马光《续诗话》、刘攽《诗话》归入文史类等(脱脱等:《宋史》卷二〇六、卷二〇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5227、5229、5409、5410页),显得比较杂乱。不过笔者未见其他如此归类的书目,故本文不对这类情况进行特别讨论。

②沈初等撰,杜泽逊、何灿点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99—410页。

③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1746页。

正如章学诚所云:“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①以闲谈杂说为主的子部说家,也许反要劣于文集一等。因此,《浙江总录》将诗文评之作置于子部说家,应该是包含不甚重视的态度的,即便不说是出于贬低。当然,这一设置究竟是出于浙江学者的精心考虑还是无意为之,已难以揣测。但恰恰是这部《浙江总录》对诗文评的特殊定位,由于符合朝鲜诗话的基本特点,被朝鲜目录学家有意择取并代代沿袭,形成了朝鲜书目中的普遍现象。

2. 朝鲜书目借鉴《浙江总录》的具体表现

学界公认朝鲜目录学的成熟直接源于对《四库总目》的借鉴,这确实是事实。《奎章总目》的编者徐浩修于正祖十四年(1790)出使清朝,其《燕行记》记录与纪昀的初次见面曰:“纪尚书……晓岚,以博雅有盛名,编纂《四库全书》。”^②认为此乃纪昀最有代表性的贡献,后续二人又就《四库全书》多次交谈。《奎章总目》的具体解题也不乏对《四库总目》的采用,仅就诗文评作品而言,《岁寒堂诗话》《浩然斋雅谈》的解题便是因袭《四库总目》而来。但在《四库总目》的影响之外,朝鲜书目尚存在对《浙江总录》的大量借鉴^③,而此点与朝鲜书目对诗文评作品的归类方式直接相关,故本文着重论述此点。

朝鲜书目对《浙江总录》的借鉴是多方位的。《奎章总目》凡例认为“凡古今目录之家,体裁有三”:总纪古今之图书者、通纪一代之图书者和但纪一方一家之图书者;其中对第三类的举例,便有《浙江总录》一书^④。且该书目也直接被《奎章总目》著录:《奎章总目》史部“总目类”仅有《直斋书录解题》、《浙江书目》(即《浙江总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部书目,均附解题,其中对《浙江总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详其卷帙,叙其撰人,述其大旨,又或略举序文跋语,而遇有希罕之本,别载某氏所藏云。^⑤

①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919页。

②徐浩修:《燕行记》卷三,[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5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19页。

③详参涂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流传及其在东亚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2024年第2期,第28—32页。

④《奎章总目》卷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10—11页。

⑤《奎章总目》卷二,《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169页。

由于对《浙江总录》评价较高,在具体解题时,《奎章总目》也就对其有大量沿袭,诗文评之作中,像《古今词话》一书,《奎章总目》解题为:“清吴江沈雄、休宁江尚质同辑,分词品、词评、词辨,凡三门。”^①完全沿用《浙江总录》,只将原本^②之“国朝”二字改成“清”而已,这与并未提及编者江尚质的《四库总目》就有所不同。笔者比对发现,至少有 15 类 29 种著作(详见表 1),《奎章总目》的解题同于《浙江总录》或为其节抄,而均不同于《四库总目》(部分属《四库》未收书)。

表 1 《奎章总目》解题同于《浙江总录》一览表

《奎章总目》	类目	具体著作
经部	易类	《郭氏传家易说》《诚斋易传》
	礼类	《周礼注疏删翼》
	乐类	《苑洛志乐》
	四书类	《四书辑释章图大成》《四书因问》
史部	编年类	《昭代典则》《嘉隆两朝闻见纪》
	掌故类	《大明集礼》《谥法纂》
	地理类	《读史方輿纪要》
子部	儒家类	《困知记》《明儒学案》
	医家类	《大观本草》
	兵家类	《武备志》
	说家类	《鸿苞集》《古今词话》
	艺玩类	《博古图》
	类事类	《事文类聚》《三才图会》《时物典汇》《天中记》
集部	总集类	《百三家集》
	别集类	《皇甫持正集》《许文穆公集》《玉恩堂集》《黄离草》 《宝日堂集》《止止堂集》

由表 1 可知《奎章总目》对《浙江总录》沿袭之多。《奎章总目》之后,徐有槩所撰《镂版考》对《浙江总录》的参考更为明确,其凡例自述曰:

是书分门立纲,亦用四类,而若其宏纲之中,细目条分,则又损益

①《奎章总目》卷三,《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 1 册,第 254 页。

②《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第 410 页。

折衷于历代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锺音《浙江遗书总录》诸书，凡其一类一书之离合进退，未尝不兢兢乎博参而慎取，庶几绎书名、按部位而作者之大指瞭如指掌云。^①

此处消息大有关键：徐有榘自述在思考此书的“宏纲”“细目”时，有对《浙江总录》的“损益折衷”处，而完全没有提及《四库总目》。由此可以明确，《镂版考》类例设置上，必然存在对《浙江总录》的借鉴。

韩致齋（1765—1814）所撰《海东绎史·艺文志》乃现存唯一依四部分类的朝鲜史志目录。《海东绎史》卷首“引用书目”分“中国书”与“日本书”，中国书中便有《浙江书目》（即《浙江总录》）^②。而对《浙江总录》的借鉴最为极端之例，当属《内阁访书录》。已有学者指出，此书解题基本是抄录《浙江总录》而来，唯对少数不见于《浙江总录》之书的解题，亦参考《直斋书录解题》《经义考》等其他书目^③。可见《浙江总录》对朝鲜目录学的影响之深。

如上所述，朝鲜文人对《浙江总录》的评价较高，编写书目时于凡例与具体解题对其都多有借鉴。《浙江总录》作为一部清代的地方采集目录，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大，也未获得较高评价，但它经过异域目录学家的采用，在朝鲜书目中延续了其生命力，焕发出新的光彩，前所论述的将诗文评之作归于子部说家的类例设置，即为富有特色的表现之一。考虑到这一分类方式与“说家”一词在中国目录中的特殊性，以及徐浩修、徐有榘等早期朝鲜目录学家对《浙江总录》的肯定与参考，特别是《镂版考》凡例中的自述，我们可以肯定朝鲜书目的这一类例直接源自对《浙江总录》的借鉴，且得到了此后目录学家的不断继承。

需要注意的是，朝鲜目录学家对《直斋书录解题》《四库总目》等其他中国书目同样相当了解并多有吸收，其在编撰书目时并非对某一中国书目机械挪用，而是针对朝鲜的学术情况予以选择性地借鉴，同时亦有自出机杼之处。朝鲜书目著录诗文评著作时，不取中国古代书目于集部设专

①《镂版考》卷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4册，第1709—1710页。

②韩致齋：《海东绎史》卷首，朝鲜光文会，1912年刊行本，第10页。按，“引用书目”中尚列有《直斋书录解题》《世善堂藏书目》《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其他四部中国书目。

③赵望秦、蔡丹：《〈内阁访书录〉为〈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之节抄》，《文献》2012年第2期，第77—82页。

类的一般类例,唯独选用《浙江总录》置于子部“说家类”的独特分类方式,不仅与朝鲜诗话重事轻辞的特点相匹配,更体现出对诗文评著作不甚重视的态度。《浙江总录》尚于子部“说家类”下设“文格诗话”,而朝鲜书目除《洪氏读书录》外,鲜为诗文评专设一类,只是将其与小说笔记杂列,这就进一步消解了诗文评的独特性,展现出朝鲜文人对诗文评之作的轻视。可见,书目类例可以体现学术观念,观念首先是事实的反映,同时可在不同区域之间以书籍与人为媒介展开交流,而即便交流过程中某一方产生的影响更加强烈,具体如何被选择依然是接受方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三、并于诗文:日本古代书目中的诗文评

与中国、朝鲜书目相比,日本书目鲜少采取四部分类,而表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貌。其中,王室书目、私家书目、书林出版书目和部分读书指导目录,与“诗文评的定位”这一话题较为相关;江户时期大量出现的中国学入门书,具有读书指导性质,也多有对诗文评作品的涉及。

(一)日本书目中诗文评的位置

除时代较早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外,日本书目普遍将诗文评之作杂列于诗文作品之间,此乃日本书目有别于朝鲜与中国书目的特异之处。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书目,成书时间相当于唐昭宗时期,凡40类,虽未题以经史子集之名,排列顺序实依四部。其中,经部末尾“小学家”收录《诗品》和《四声指归》《笔札华梁》《文笔式》等三十多种诗格,又有《注诗品》一书被著录于子部“杂家”,而《文心雕龙》则重见于“杂家”和集部“总集家”^①。由这一书目可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当时日本诗格类作品众多且被尊为轨范法式。诗格被列于小学家,意味着其与字书、韵书一样是需被遵守的轨范,而将之附于经部也赋予了较高的地位。反观中国,在“规范诗学”的唐代虽有大量诗格,但多被视为指导初学和应举的工具,不甚受重视,以至藤原佐世著录的初盛唐诗格在后世中国大都亡佚。中国书目中,著录唐代诗格最多的应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所录亦不超过二十种,且对诗格类作品持批评态度:“凡世所传诗格,大率相似。余尝书其末曰:‘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

^①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编:《日本書目大成》第1册,汲古書院,1979年,第13—14、26、25、39页。

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①至于朝鲜,诗格之作几乎从未流行。可见日本文人对诗格重视程度之高。其二,藤原佐世意识到《诗品》和《文心雕龙》与诗格类作品有所不同。二书均被重复著录,或许是编者一时疏忽所致,但也可能是归类时有所踌躇,对它们的定位比较模糊的体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后,日本著录《文心雕龙》和《诗品》的书目很少^②,直到江户时代始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两部书对诗文创作的重要性(说详下文)。

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诗格置于“小学家”的做法,后世书目少有沿袭,而是多将诗格、诗话与诗文作品混杂排列,无论私家书目还是书林出版书目均然。私家书目中,兰陵山人编、1782年刊的《掌中目录》,首四类为经籍、史类、子类、诗文体,略近四部^③,诗文体著录《文章缘起》《东人诗话》《冰川诗式》《诗法指南》等多部诗文评作品^④,将诗格、诗话视为与诗文密切相关之作。又如1802年刊的《群书一览》是尾崎雅嘉对平生寓目书籍的记录,不依四部,共分34类,其中诗文体以总集别集为主,但也著录有《文镜秘府论》、林春信《史馆茗话》和江村绶《日本诗史》三部诗格诗话^⑤。

所谓书林出版目录,指私家出版商出于经销目的宣传自家书籍的营业目录,大量出现于江户时代庆长年间以下。它们普遍著录有大量诗格诗话,早期以中国书籍为多,后渐以日本书籍为多。表2以其中两部为例:

①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第645页。至于中国古代其他书目,则鲜少著录唐代诗格。

②但将这两部作品视为杂家的观念在江户时代书目中依然存在:高井兰山编、1827年刊的读书指导目录《掌中书名便览》仅著录《文心雕龙》《诗品》两部诗文评作品,但不在“名家诸集”之部,而是与《颜氏家训》《春秋繁露》等小说、杂传、子书并列于“汉魏丛书”之部(《日本书目大成》第3册,第248页)。可见编者虽意识到这两部书在中国文人心中的重要性,但是把它们当成类似子书的形式来看待的,这可谓《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在后世的回响。

③《掌中目录》在这四类之后又有百家、医书目录、军书三类。

④兰陵山人:《掌中目录》,《日本书目大成》第3册,第238—239页。

⑤尾崎雅嘉:《群书一览》,《日本书目大成》第1册,第382、385、386页。

表2 江戸时代书林出版目录著录诗文评著作举例

书目	刊刻时间	诗文评作品 所属之类	所录诗文评作品举例
《增补书籍目录》 (付大意撰)	宽文十年 (1670)	诗集并连句	《诗法源流》《冰川诗式》《童蒙诗式》 《诗人玉屑》《诗林广记》《诗格》《史 馆茗话》《圆机活法》 ^①
《大增书籍目录》	明和九年 (1772)	文集尺牍	《古今文则》《古文矩并文变》《初学 作文法》《训释示蒙》 ^②
		诗集赠答	《唐明诗格》《诗文制式》《诗学逢 原》《诗文准绳》 ^③

表2可见书林出版目录中诗文评作品之丰富。江戸书肆既多刊刻诗话诗格,说明这些作品在当时颇为畅销;将之与诗集作品并列一类,可见时人认为它们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目亦存在将诗话作品分属两类者。幸岛宗意编、1702年刊的《倭版书籍考》卷七为“诗文尺牍之部”,在别集、总集之间列有多部诗文评:既有《诗人玉屑》《诗林广记》《冰川诗式》《诗藪》四部在《四库总目》中属于诗文评类的作品,也有在中国亡佚已久的合诗格、诗话、诗选为一体的《联珠诗格》,又有《文镜秘府论》、贝原笃信《初学诗法》、虑庵春洞《童蒙诗式》等日本诗格,还有朝鲜的《东人诗话》^④,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但在卷六“诸子百家之部”又著录有日人黄檗高泉《山堂清话》,且解题曰“诗话杂说之著也”^⑤。可见同样是诗话作品,或被置于诸子百家之部,或被置于诗文尺牍之部,而划分标准在于诗话“杂说”比例的高低,这与第一节所讨论的朝鲜书目《洪氏读书录》相似:都意识到不同诗话中诗文评含量的不同并在分类时进行区分。

①《增补书籍目录》,慶應義塾大學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编:《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第1册,井上書房,1962年,第84—85页。

②《大增书籍目录》中卷,《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第3册,井上書房,1963年,第194—195页。

③《大增书籍目录》中卷,《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第3册,第196页。

④幸岛宗意:《倭版书籍考》,《日本書目大成》第3册,第51—60页。

⑤幸岛宗意:《倭版书籍考》,《日本書目大成》第3册,第48页。

日本书目普遍将诗话诗格混编于诗文集之间,但也存在少许书目,虽未为诗文评著作专设一类,但有意将诗文作品与诗文评著作区分排列、不相杂次。如文政三年(1820)庆元堂刊松泽老泉编《汇刻书目外集》^①,此书按四部分类,集部大致依“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之序排列,著录有《渔隐丛话》《诗林广记》《随园诗话》《诗触》《诗薮》五部诗话与《词学全书》《词科掌录》两部词话。类似的又有成书稍晚的《佐伯献书目录》^②,于集部之末著录有《文心雕龙训故》《诗薮》《历代诗话》等16部诗文评作品,同样与总集、别集等区分排列。这类书目虽未专设诗文评之类,但对诗文评作品与诗文集有所区分,可见编者对评诗论文之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故于编次时有所体现。

那么,古代日本有没有为诗文评作品专设一类^③的书目呢?笔者寓目所及仅有《国朝书目》与《林家书目》两部。藤井贞干编、宽政三年(1791)刊的《国朝书目》与诗文相关者共有三类:“诗集”(下分“总集”“斗诗”“诗歌”)、“诗文别集”与“诗文杂书”。其中“诗文杂书”类共五部:《文镜秘府论》《文章指南》《作文大体》《文笔要钞》《本朝诗杂例》^④,全为诗文评著作,且均属诗格或文格。“诗文杂书”也就是杂书诗文,既对这些作品所讨论的对象(诗文)进行了限定,也指出了这些著作的杂说性质,不过“杂书”二字有泛泛而论之义,对这类作品似未给予较高评价,但为诗文评专门设类,说明编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类作品的特殊性,而这五

①《汇刻书目外集》可在此网站在线阅读:<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7756?page=4>。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汇刻书目外集》是对顾修《汇刻书目》的补订之作,松泽老泉自序曰:“此编虽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区别次第,错杂出入、不加精核者,一遵顾氏《汇刻》之式,不复细分其部云。”故未设二级类目。

②《佐伯献书目录》可在此网站在线阅读:<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037068&ID=&TYPE=>。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此书所列诗文评作品间杂有一部《金石录》,当为编者误置。

③此处“为诗文评作品专设一类”指日本目录学家自出机杼者,不包括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出现的几部完全照搬四库分类、故设有诗文评类的《经籍访古志》《静嘉堂秘籍志》等书目。

④藤井贞干:《国朝书目》,《日本書目大成》第3册,第211页。

部作品也进一步印证日本诗文评中诗格的比例之高。《林家书目》^①乃写本,成书于文政四年(1821),全书共十册,总体分“赐书”“经史子集”“和书”“韩书”“家著”“别书”几大部分,其中按四部分类的都是汉籍,每部各一册,是书目的主体。集部下分“别集类”“总集类”“文史类”,“文史类”包含《文心雕龙》《本事诗》《冰川诗式》《诗话总龟》《文则》《文式》《联珠诗格》《带经堂诗话》等多部诗文评著作,同时又著录有《史通注》与《史通通释》。此书不仅为诗文评专门设类,且包含《文心雕龙》《本事诗》与多种诗格、文格、诗话类作品,体现出对评诗论文之作的清晰判断,在日本书目中可谓罕见。而将《史通》置于其间,与《直斋书录解題》等中国书目“文史类”的类例设置遥相呼应,说明编者尚未将诗文评与史评类区分开来,这也许是受到相关中国书目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作为日本少有的为诗文评作品设类的书目,《国朝书目》与《林家书目》体现出较强的文学批评意识,这在日本书目中非常特别。

(二) 日本文人对诗技之作的偏爱及其原因

由日本书目著录诗文评的情况可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就种类与数量来说,诗格是日本最流行的一类诗文评著作,相较之下诗话则备受冷落。其二,就观念来说,无论是与诗集文集并列,还是特设“诗文杂书”,日本书目对于诗文评的定位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将此类作品当作指导诗文创作的工具。

日本书目多无小序或解題,故从书目本身不易窥探目录学家的深层观念,但由书目得出的上述结论,可被其他文献进一步证实。江户时期大量出现的中国学入门书,是日本学者为子弟开列的汉籍研究入门指导和阅读清单,略近于读书推荐目录,其中多有对诗文评之作的介绍。像清水宜稻的《自迓斋学话》有“诗”一类,列有《诗语碎金》《诗学小成》《诗法授幼钞》《圆机活法》等诸多诗格类著作,且称需要“熟读”^②。这些诗格具有小学化的特点,无疑与入门书为童蒙所设有关,便于初学者学习汉诗创作。又如林述斋《初学课业次第》分经史子集四部,集部列出《沧浪诗话》

①《林家书目》可在此网站在线阅读: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37027&ID=&NO=5&TYPE=JPEG&DL_TYPE=pdf。笔者最后登录时间:2024年9月12日。

②清水宜稻:《自迓斋学话》,[日]長澤規矩也编:《江戸時代支那學入門書解題集成》第二集,汲古書院,1975年,第59—61页。

《诗人玉屑》《怀麓堂诗话》《渔洋诗话》四部中国诗话,总结曰“诗话类,亦共若干”,并称如能“熟读”将大有裨益^①。四部书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诗艺类诗话,可见日本文人对诗论诗法的偏尚。

也许是出于对诗艺的喜爱,江户时代文人意识到《文心雕龙》和《诗品》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如林东溟《诸体诗则》专辟“书品”一栏,分类列举中日应读之书,其中“古今诗话宜玩者”列有《文心雕龙》《诗品》《三家诗话》《艺苑卮言》和《诗薮》;《三家诗话》即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和王世懋《艺圃撷余》^②,故所举书目实有七部。林东溟这里所用“诗话”一词即为诗文评之义,七部著作都有很强的理论性,体现出对诗歌评论的艺术追求。

与对诗艺诗技之作的偏爱相反,对闲谈杂说类诗话的批评在日本甚至成为一种风气。如江户儒者芥川丹丘曰:“古今诗话,惟严仪卿《沧浪诗话》断千古公案……其他欧阳公《六一诗话》、司马温公《诗话》之类,率皆资一时谈柄耳。于诗学实没干涉,初学略之而可也。”^③而古贺侗庵《非诗话》专门批评中国诗话,是古代东亚唯一一部批评诗话的专书。该书认为“唐宋而降,诗话为著书之一体,殆与经史子集对峙”,然而“唐人不著诗话而诗盛,宋人好作诗话而诗熄”^④。《非诗话》采取广义的诗话观念,也批评了部分宋元以降的诗格,但显然对闲谈之作最为不满。不过他虽对诗话一体深恶痛绝,也还是让步说“诗话中惟鍾嶸《诗品》、严沧浪《诗话》、李西涯《怀麓堂诗话》、徐昌谷《谈艺录》可以供消闲之具”^⑤,可见比较重视诗歌理论。《非诗话》之外,他又撰有读书指导书目《读书矩》,其子为之作序云:

书有本末有醇驳,入不得其门乃终身惑焉。故先君设此矩,以便

①林述斋撰,佐藤一斋补订:《初学课业次第》,影印江户末期木活字印本,《江户时代支那學入門書解題集成》第二集,第242页。按,《初学课业次第》存在多个版本,各本内容互有补充,如天保七年(1836)写本就又列有《苕溪渔隐丛话》《文则》两部诗文评(《江户时代支那學入門書解題集成》第二集,第190页)。

②林东溟:《诸体诗则》,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校:《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816页。

③芥川丹丘:《丹丘诗话》卷下,《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第854页。

④古贺侗庵:《侗庵非诗话》卷二,《日本汉诗话集成》第5册,第2066、2057页。

⑤古贺侗庵:《侗庵非诗话》卷二,《日本汉诗话集成》第5册,第2070页。

于生徒先后缓急之序秩。^①

此书分入门、上堂、入室之学三类,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之义。入室一类列有《文心雕龙》和《三家诗话》,属古贺侗庵心中少有的值得一读的诗文评著作。《三家诗话》中有两部与《非诗话》略有肯定者重合,可进一步印证他对诗格诗艺的重视。

日本文人对诗格类作品的偏爱渊源有自。在汉诗创作流行之前,日本和歌学已蔚为兴盛,奈良时代便产生了《歌经标式》这部讨论歌病、歌体等问题的和歌学著作。平安时代前期,空海入唐,搜集大量唐人诗格编成《文镜秘府论》,此乃日本第一部诗文评专书,其诗格汇编为主的性质,不仅适应于日本歌学传统,也决定了此后日本诗文评发展的诗格化方向。日本文人赋予吟诗作赋以很高的审美性,认为诗文创作不仅独立于经学传统,甚至本身就是学问的根基:

夫学问之道,作文为先。若只诵经书,不习诗赋,则所谓“书厨子”,而如无益矣。辨四声,详其义,嘲风月,味其理,莫不起自此焉。^② 诗文创作既被如此重视,在论诗时日本文人也更为关注诗歌本身。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凡例》称:“是编论诗以及人,非传人以及诗。”^③便与洪奭周等朝鲜文人因人存书的思想不同。具体到对“诗话”一词的定义,日本文人也有独到之见。斋藤馨《诗山堂诗话序》云:

有诗而后有诗话,故古所谓诗话者,诗之自话也,非人之话诗也。^④

相较于对诗话“以人话诗”“以资闲谈”的传统定位,斋藤馨强调诗话具有揭示诗歌自身特点的价值,并予以肯定,体现出与中国和朝鲜不一样的取向。相比于诗歌本事,日本文人更偏爱单纯的评诗论文之作,这也与对诗话一体的定位有关。

在此可举一部特殊的日本诗文评提供反证。江户初期的藤原惺窝专研朱子学,是日本“宋学之祖”,在当时日本文人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文话《文章达德纲领》卷首有朝鲜儒者姜沆所作之序,姜沆对比藤原和其

①古贺增敬:《读书矩序》,《读书矩》卷首,《江戸時代支那學入門書解題集成》第二集,第91页。

②藤原宗忠:《作文大体》“序”,《日本汉诗话集成》第1册,第243页。

③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凡例》,《日本汉诗话集成》第2册,第870页。

④斋藤馨:《诗山堂诗话序》,《日本汉诗话集成》第7册,第3157页。

他日本学者道：

（藤原）一切以扩天理、收放心为学问根本……日东学者，阖国

唯知有记诵词章之学，未知有圣贤性理存养省察知行合一之学。^①

姜沆作为朝鲜文人，通过“异域之眼”观看日本，在肯定藤原惺窝的同时批评日本学风，甚至称藤原生于日本，不啻“振发一方之盲聩”^②；至于藤原此书评诗论文的属性，姜沆在序中几乎全然未提及。姜沆的判断暗含对朝鲜的揶揄，但也映射出当时朝鲜和日本文坛的巨大差异：正因日本诗文评大多只关注“记诵词章”的诗文本身，不像朝鲜文人以道德学问为诗文根柢，他才会序言中反复强调藤原惺窝对性理之学的重视和精通。这部连接了朝鲜与日本的文话，生动表现出两国文人批评观念的不同。

四、结语

在一般的观念里，古典目录学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优秀的目录之书不仅能保存古代书籍史料，更是学者们进行学术分类乃至学术批评的阵地。通过考察古代书目著录诗文评作品的类例、小序与解题，可以获知古人对这些作品的具体评价，把握古代文学批评观念，从而使文献资料发挥思想史的价值。在考察范围上，本文关注韩、日二国并将其与中国比较，这不只是因为批评著作和目录之书在古代三国均有存在，更因为三个国家同处于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文字与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也正因彼此的相似，其间的同中之异就更富意味。经过比较可以获知，三国文人批评观念的差异和所偏爱的不同诗文评种类；而对三国文艺思想的整体把握，自然也有助于对不同文学创作和具体批评的更好理解。

总之，本文是以目录学为基础、以东亚汉文化圈为方法，探究中日韩三国古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尝试之作。希望能为东亚文学批评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份具体的案例。

【作者简介】成亚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域外汉籍。

①姜沆：《文章达德纲领叙》，藤原惺窝：《文章达德纲领》卷首，《日本汉诗话集成》第1册，第301页。

②姜沆：《文章达德纲领叙》，《日本汉诗话集成》第1册，第302页。